

沽上消寒会

甄明

旧时冬日,文人雅士们往往举办消寒会的活动,从冬至开始,招集九人,每隔九天,轮流由一人做东,举行酒会,赋诗赌酒,彻夜交欢。沽上消寒会,随着时代变迁而翻新。

消寒会初称暖冬会,起源于唐代。到了清代,消寒会盛行于北方。《红楼梦》第九二回:“明儿不是十一月初一日么?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个老规矩,要办‘消寒会’,齐打伙儿坐下,喝酒说笑。”清《燕京杂记》云:“冬月,士大夫约同人围炉饮酒,迭为宾主,谓之‘消寒’。好事者联以九人,定以九日,取九九消寒之义”。清光绪十八年(1892),津门诗坛领袖杨光仪与门生、故旧创立消寒诗社,前后多达二三十人人入社。每次聚会,选择不同的

诗题与韵脚,然后各自作诗,所得诗篇辑为《消寒集》行世。那时消寒会的规模不一,但与会人数必取“明九”与“暗九”(如十八、二十七等)之数。文人们围炉吟诗作画,以为娱乐,其诗词字画亦必应“九”之典。但是后来也没有这么讲究了。

杭州人夏曾佑考取进士后,在京任清廷礼部主事,后改候补知县。光绪二十二年(1896),应同乡孙宝琦之邀到津担任北洋育才馆教习,并与严复、王修植开办《国闻报》。夏曾佑住在紫竹林租

界,经常去小白楼(餐厅)聚会。据《夏曾佑日记》:光绪二十四年(1898)“十一月二十七日阴,晚与澜生、信皆、药雨、亦湘、澍棠在饮于小白楼,是为消寒会之第一集。”这是第一次消寒会的记录。日记记载消寒会共五次,皆在小小白楼。但每次聚会的人数不一,第一次6人、第二次10人、第三次11人、第四次13人、第五次11人。纵观夏曾佑召集的消寒会,每次仅隔七天,人数不定,更不拘泥于“九”字之说。

沽上消寒会,也不局限于轮流作做东。民国年间,天津有位郭姓寒士,喜欢作诗,想召集文人骚客作一消寒会,以便饮酒作诗,兼大快朵颐。为征召同好参加,遂请报人戴愚庵代为执笔《拟消寒会小启》,云:“香炸虽贵,有寒怎好不消。新诗宜

清,无酒何能取乐。拟招骚人,同人雅集。如来祈带兼金,所拟各摊一份。谨占某与某日,座假某园某官。与会者,请如姜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。贲临者,当效楚霸王请客,闲人免进,此启。”这份启示文辞幽默风趣,可见举办消寒会却是AA制的“各摊一份”,而且“愿者上钩”全凭自愿。

1943年11月21日,天津城南诗社在致美斋举办消寒雅集,到会社友有樊筱芳、王吟笙、李一庵、刘云荪、黄浩尘、孙正荪、王占侯、王禹人、张梯青、张聊公、王月桥等。饭后由王吟笙命题,以“十月先开岭上梅”为第一句,作成七律一首;又命诗钟题,为“小”“雪”鹤顶格。社长李金藻未出席雅集,却应题作诗一首:“十月先开岭上梅,此花应占百花魁。杏园尚把春关住,黍谷才教律转回。几见诗人踏雪去,者番芳讯故乡来。天公似促消寒课,菊过重阳早日催。”在寒风料峭的冬日,消寒诗作为津门诗坛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春意。

城隍返乡

曲振明

早年间,天津西郊曹家庄西头,有一处观音寺,前殿供奉一尊穿清朝服饰、白脸黑胡的泥塑神像,十分新奇。

1947年,《纪事报画刊》记者专门采访了村内79岁的马叟。据说所塑之人姓冯名君美,生前在天津县署充任皂班衙役,秉性耿直。去世后被奉为县庙城隍神,不仅如此,“并作静海县城隍一任”。旧时的城隍,由不同的人出任,选择的标准多为殉国的忠烈之士,或是正直聪明的人物。大多数城隍不

知出自何处,而这位冯爷确为曹庄人。

庚子事变后,城隍庙为巡警占用。民国时期,废庙兴学又成为小学。马叟称“十余年前,冯爷曾到曹家庄托梦云,愿由天津城隍庙内殿搬至该村庙内享受香火”。于是热心的曹庄人套马车,到城隍庙迎神。据说“返乡时,表面虽系空车,拉车的肥大的骡子累得满身大汗。供奉塑像后……周围二十余里,各村男女俱来焚香,庙场很热闹”。由于马叟说得真切,记者权当一个有趣的故事记述下来。

张慈生改行

音十

1928年冬,罗振玉卖掉天津嘉乐里斋舍,携家迁往旅顺,他在津开办的书店、工厂等随之停办。罗离开天津时,将甲骨等随之移藏大连,但天津仍留有其大量藏书、字画。据称,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张慈生早年经营古玩生意,后来他就是因为收购到罗家的旧藏,增长了见识,进而打消了改行念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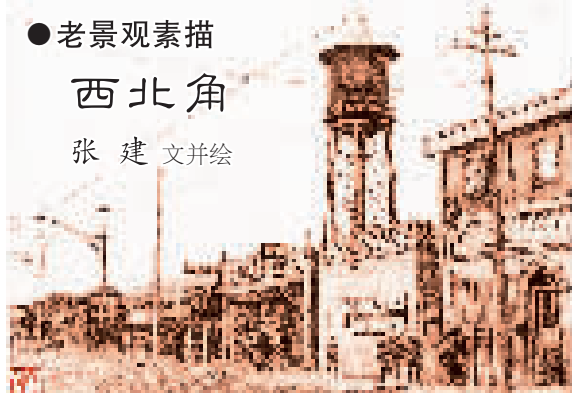
张先生在自述中说:“(新中国成立)初期……天津古玩业曾经一度普遍萧条,除经营字画的商店尚能维持外,经营古玩、珠宝的商店皆处于半停顿状态。

一些古玩商改行干别的,当时我已改行做中医。一天,有人托我到劝业场买点金货,刚上一楼,就见有人怀里抱着东西下楼,由于走得急,我们俩差点撞着,他的东西都散落在地上。我一看全部是字画,就忍不住问他,你带这些字画干什么?他说,劝业场不收,我说,你交给我吧。于是,我就抱着这些画跑到北京,到了北京很快就给卖了,把钱给了人家。通过这件事,我一看,这一行还可以干,我就又回到了劝业场,重新开始了古玩生意。”那位出让字画的人便是罗振玉的后代。

老景观素描

西北角

张建文并绘



天津人所说的西北角,曾是天津繁华地带之一,旧时期这里设有很多衙门,建有年代最为久远的城隍庙,还有文昌宫、广智馆和市内第一个自来水大水塔。天津

卫三宗宝之一的铃铛阁也坐落在这个范围内,初名稽古寺,建自唐代。明万历七年(1579),建藏经阁,阁角装有风铃,铃声可远闻数里,乡人皆称铃铛阁。

里埋了,又将方砖铺回原样。和孙涛一样,布店的伙计孙玉俊给顾客送布,去后未回;邢云亭高高高兴兴去上学,再也没有回家;张玉林连出去洗个澡,都惨遭杀害;18岁的张树德则被邻居骗走……他们的离去,让当时的津城都弥漫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伤,弥漫着对这惨绝人寰的绑架的悲愤,也弥漫着严惩绑匪的高呼之声。

罪犯再狡猾,总会有失手的时候。这伙绑匪在实施另一起案件时,露出了马脚,于是警察顺藤摸瓜先后在南市、河东、英租界等处将十余名绑匪抓捕归案。绑匪们的埋尸地点遍及全市,警察在南市大舞台对过春兴里、南市杏花村庆善里、南市富贵庄富民里、法租界同善里刘家女仆店、法租界立兴里等地点共起获12具尸体。这些尸体大多已成累累白骨。

十几名绑匪,为什么在津城肆虐长达三年才失手?据警方分析,主要是受害者

家属不敢报警,生怕一旦报警,人命不保。他们哪会想到,在他们接到绑匪交钱赎人消息时,亲人早已殒命。要不是刘志华案的家属在第一时间选择报警,还不知绑匪何时会落网。其次,这个以张连科为首、组织了十几人的绑架团伙,组织严密,分工明确,有的策划,有的踩点,有的指挥,有的行动。他们绑架的方法费尽心机,绑人从不用胁迫的手段,而是加以引诱,几乎都是杀熟。被绑者或与匪中拉线者为朋友,或为戚谊,或因送货而被绑。为了防止被绑者呼救、逃走,被绑者一到,当即被杀害。此外,掩埋尸体的坑都是实施绑架之前就挖好的,推入尸体后仔细掩埋。如果屋中原有地板,再将地板钉妥;若为砖地,则用砖砌好,不露痕迹。然后迁居他处,从此销声匿迹,但仍向事主接洽赎票。

1935年10月6日下午三点半,罪大恶极的十几名案犯,在小王庄刑场被执行枪决。

老口福

油盐饽饽

杨世珊

有种小众美食,就是在如今的天津农村也不多见——油盐饽饽。

上世纪七

八十年代,我在天津小南河村生活期间,吃过这种小吃。而且,我当时听过一个故事。村里有一家三个男劳力外出打草,一天打了两大车;爷仨儿直接把草卖到奶牛场,净得一百元。在家的妈妈听了非常高兴,让他们爷儿几个去炕上躺一会儿,说给大家做好吃的。

爸爸和两个弟弟休息了,大闺女跟在妈妈身后问:“是要包饺子吗?”妈妈答:“来不及了,再说也没肉啊。”

妈妈收拾大锅,舀出新棒子面,贴饽饽。大闺女烧火,妈妈先是贴了一锅饽饽,又在外面的风锅子熬绿豆汤。大闺女的任务是看好两个灶,烧火。工夫不大,妈妈看看锅盖边沿儿冒

大圆气了,便揭锅盖,又揭饽饽,盛绿豆汤。忙乎完了,妈妈嘱咐闺女:“快叫你

爸爸和弟弟起来吃饭,趁热,饽饽嘎儿脆。”

妈妈早有准备,把饽饽拿起,用刀片成两半儿,迅速抹上香油,再撒些盐,再将两片饽饽合上再搓搓,使得油盐涂抹均匀。棒子面饽饽闪着金光,亮得冒油。吃一口这油盐饽饽,饽饽嘎儿脆,棒子面的清甜香味让人垂涎——最耐人寻味的是香油和盐结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香味,不可言喻。一家人其乐融融,虽粗茶淡饭,却幸福得很。

几十年了过去,现在也没多少人知道这油盐饽饽了。北方有种小吃叫烤馍,跟这油盐饽饽倒有几分相似。只不过那烤馍类似于烤馒头片儿,更为精致,口味也多。

故事天津

我家经历的民国绑票案

王庆普

1933年至1935年,天津发生了匪徒实施11起绑票案,杀害无辜平民12人的案件,其中一起就与我家有关。

我爷爷叫王春阁,字小楼,1889年出生,从河北黄骅来津后开了一家租赁桌椅板凳、制家具农具的门店。门店生意日渐兴隆,一家人的日子随之红火起来。1929年,我大姑王秀芬嫁给某公司的会计孙涛为妻。1935年秋的一天晚上六七点钟,有人往孙涛的公司打电话,说孙涛的舅母来津,住在法租界三井洋行对过的立兴里,叫他前去送些钱。孙涛信以为真,连忙带了些钱两赶往立兴里3号。谁知他这一去,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几天后,急得团团转的爷爷收到一封信:“因有急需,无法筹措,故将孙涛绑票,望速备款三万元,到天津河东大直

沽大影壁下接洽赎回。不许报警!不然撕票。”

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,一家人一下子慌了。三万元大洋对于王家来说,数额巨大,家中哪有这么多现钱?爷爷当机立断,赶紧变卖典当家财,同时四处筹借钱款。出乎意料的是,没过几天,钱还没凑齐,绑匪就被抓获了,爷爷才知道女婿已经遇害。一家人悲痛欲绝,大姑更是几度昏厥。

后来据警方通报,绑匪事先打探到孙涛岳家有些油水可榨,于是设计了前面的计策。绑匪先在法租界立兴里的一间房子里挖好了坑,里面铺好石灰,上面盖上市子。孙涛前脚进屋,几个大汉便冲上前来,将他摞倒在地,用绳子从后面勒住了他的脖子,迅速收紧……孙涛遇害后,绑匪把他推进坑

西门外育黎堂

吴裕成

“西郊内设有黎堂,收养乏食穷民及异籍流落者”。津城历史上,慈善收容机构年代较远者,有西门外育黎堂。清康熙二十六年(1687),由天津道石天枢创立,收容“四方羁旅之病无所依者”。做起来了,能持之以恒吗?接任者朱士杰“恐育黎堂日久废坠”,为求“久安之道”,申请从赋税盈余中拨给银两,并带头倡捐,置办田产,以地租维持堂务所需。一应事项,“登记历历,规约井井”,刻碑

记之。乾隆三年(1738),陈弘谋来任天津道。其时育黎堂“日久弊生,渐就废弛”。陈弘谋《飭议育黎堂条规檄》言及补救措施,“存银二千一百一十两交与商人查日昌,以一分五厘行息,按月支取,以为堂中一切费用”。所说查日昌(乾),为水西庄主人。陈弘谋就此盛赞查氏“首倡乐助”,是水西庄研究的一条材料。

关于育黎堂的延续,1929年陈宝泉《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一贫民救济院院长就职宣言》说,“本院之前名曰育黎堂,厥后改为教养所”。

